

台灣政府的公共建設政策、 選舉文化， 與姚瑞中的「海市蜃樓：台灣 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

呂佩怡
獨立策展人

「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從2010年初持續進行中。藝術家姚瑞中與學生們組成的團體「失落社會檔案室」（Lost Society Document, LSD）一起行動，學生們返鄉以藝術家之眼進行田野踏查與拍攝，目前已進行四百多個閒置公共設施調查，出版三本專刊，第四本即將出版。這些每本厚達六百多頁黑白檔案圖鑑式專書，真切而實際的揭露這些一直生活在我們週遭、但被我們所忽略的社會現實。這些現實正是整體龐雜政經利益交織之下台灣民主進程蒼白無力的現形記，也是主標題所指出的「海市蜃樓」。

廢墟的出現

這個長期計畫裡的「閒置公共設施」是指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在不同時期，使用各式官冕堂皇名目的建設。例如九〇年代隨著解嚴後的台灣本土化熱潮，加上社區總體營造文化政策的推動，在一鄉一特色的口號之下，成立各鄉鎮地方博物館、地方文物館、或特色館做為台灣本土化概念的實踐。或是政府各部門在某些特定大計畫之下，以嘉惠於民的說法大興土木，如交通部的「一鄉鎮一停車場」；環保署推動的「一縣一焚化爐」；農委會蓋了數不盡的觀光漁市，或農產品直銷中心；內政部也不遑多讓設立一堆以社會福利為口號之建物，或社會觀光休閒設施等。當這些花費巨額公帑的公共工程與設施，在硬體建設完工後，有些沒有按照原計畫運作，有的是從未使用直接荒廢，有些面臨政府無預算支持的窘境，或者是經營不善，入不敷出，參觀人次稀少，成為低度使用的公共建物。這些淪落為「類廢墟」、「半閒置」或「已荒廢」的閒置空間即為俗稱的「蚊子館」——反諷這些空盪盪空間只拿來養蚊子，沒有任何其它功能。

「看見」廢墟

「蚊子館」是現代社會所共構出的廢墟。這個計畫必須由「看見」廢墟開始。

在廢墟中晃遊與對廢墟美學迷戀是姚瑞中從大學以來的興趣。2004年出版《台灣廢墟迷走》收錄他從1988年開始隨機性的廢墟漫遊，他用鏡頭大量記錄台灣各鄉鎮不知名的角落「人所造的了無人跡」之地，包括廢棄的民宅、工廠、倉庫、碉堡、遊樂園、渡假村等，以黑白照片定格下這些已經被時光拋棄的場域，在台灣現代化進程裡被遺忘的所在，並用遊記式書寫訴說著自己「關於如何被廢墟召喚的無聊人生^[1]」。

2007年的《廢島：台灣離島廢墟浪遊》不同於前階段隨機的漫遊與拍照，將鏡頭聚焦於因兩岸政治環境變遷造就的離島軍事廢墟、監獄廢墟等，展現的不僅是黑白影像，被時間定格的浪漫美學視角下的廢墟，也關照到背後的政治經濟學。「看見」這些做為「悲情時代下的產物」、「被人刻意遺忘的廢墟」。這些影像是「在場」的見證，既揭露隱而不顯的現實，同時也保存正在消逝中的當下，迫使觀者不僅「看見」廢墟的衰頹，更去思考廢墟所在地的政治社會環境，探詢造成這些廢墟無語與無奈背後的原因。

2010年起姚瑞中由單打獨鬥轉向集結學生共同合作行動，從冷眼旁觀到實際介入社會運作機制，尖銳地直接觸碰當下政治經濟結構的「蚊子館」，這個轉變也反映著藝術家如何回應時代。八〇年代末台灣解嚴後是社會大變動的時期，一些藝術家以積極入世的狀態，以個人熱血來對抗龐大體制，另一些藝術家則以疏離、冷眼旁觀、自我放逐的邊緣角度來觀察社會。解嚴後二十年，姚瑞中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呈現藝術家另一種的社會實踐：透過實際大量的踏查，建立檔案，大量呈現這些被掩蓋，或被遺忘的蚊子館，鐵證如山般地直指政府疏失，掀起議題，以行動擾動／撼動現實，產生實際改變效益。

「看見」廢墟的背後

「蚊子館」的生成展現了解嚴後台灣民主進展複雜交織的現象，而「蚊子館」正是民主黑暗面的鐵證如山。

八〇年代末台灣進入一個快速變遷轉型期，政治上中央一黨獨大與家長式權威時代結束，戒嚴、黨禁、報禁解除，走向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雙軌並行。早期威權時代是政治權力主導，國民黨與地方派系之間形成一個特從主義的政治聯盟：中央把地方的寡佔性經濟資源分配給少數地方派系，以交換他們的政治支持^[2]。解嚴之後，除了傳統交換模式的繼承之外，民主選舉制度又再度加強這種中央與地方、權力與資本、個人與社會利益之間綿密的交織關係。

李登輝時代^[3]為對付黨內鬥爭與黨外勢力發展遽增的壓力，並隨著政治自由化，地方勢力的分配與交換透過選舉制度進行，選舉活動中的「金權選舉」逐漸與「黑道」勾結，形成「黑金政治^[4]」，台灣的選舉走向惡質化傾向，買票、作票、賄選、綁樁、利益輸送等時有所聞，公共工程建設既是選舉政見不可或缺的一塊，更是利益分配與共犯結構之中的「油水」，自然是兵家必爭之地。

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以「阿扁沒包袱、黑金一定除」為號召奪取政權。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缺乏中央執政經驗與相關資源，日益仰賴大財團企業的支持，明確走向以資本至上為邏輯的新自由主義。在之前國民黨執政時期提出「政府再造綱領」，引進企業經營精神、BOT、委外經營與民營化，到了民進黨執政期間則以地方化、法人化、委外化、去任務化等以「四化」為主軸的施政方向，以BOT、OT、ROT等方式，納入私人企業財力以彌補政府財政資源匱乏。2004年大選，民進黨仍然可以用「不要讓黑金復辟」為口號凝聚部分選民，但之後陳水扁因為貪瀆案而入獄服刑，形成強烈對比。2008年馬英九以清廉形象當選總統，二次政黨輪替，雖然馬英九強調自身清廉，但其下屬一再出現的貪污案，對國民黨政府產生強大的殺傷力，民眾感嘆政黨輪替，政治惡習也輪替，「趕走了黑金，迎來了貪腐；趕走了貪腐，迎來了黑金」。不管是黑金還是貪腐，政府公共工程都是再分配、聯結、交換、鞏固的分贓系統，被看見的「蚊子館」正是這個民主黑洞的顯影與現形。

若「蚊子館」做為一個社會表面徵候，那「蚊子館」的背後是由甚麼樣的環境與條件所促成？也就是詢問「蚊子館是如何形成的？」、「每座蚊子館只是個案，還是暗示著不同產業的結構性問題？」，或者「蚊子館是整個社會體制共謀之下的產物？」姚瑞中認為，蚊子館正是民主政治與經濟轉型失敗的產物。在第一本專書序言中，他談到「蚊子館」產生的可能因素：「政治人物亂開競選支票、中央與地方政府決策不當且好大喜

功、追求世界第一或遠東最大規模、預估使用率過於樂觀、規劃設計不當或不符民眾使用需求、設施地處偏僻且交通不便，以及後續興建、修復或營運經費不足等因素造成，導至施工完成後使用率偏低或完全閒置情況，這種因為政治、選舉、擴大內需或試圖拉近城鄉差距所興建的『閒置公共建設』遍佈全國，至今仍方興未艾^[5]」。姚直指台灣選舉文化的弊病，公共工程建設的具體可見尤其性符合政治人物被看見的需求，但常常在政策決定上並無整體考量與配套措施，以至於後續執行營運問題重重，造成四處林立的蚊子館，體現出「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可怕」之事實。

文化評論者張鐵志進一步指認「蚊子館」反映台灣民主體制的三種政治邏輯：假民粹主義、發展主義、地方金權政治。戰後，發展主義一直是台灣的核心價值，政治人物把搞建設做為政績，以為是為人民服務，然而這些建設並非以民眾需求為出發，只是製造一個符合地方或人民利益的幻影。假民主之名，借經濟發展之口號，行地方利益分贓之實。在此，「德政」弔詭的翻身為「惡政」。荒誕的「蚊子館」正是此種看似巨大華麗但其實貧乏而不能運作的海市蜃樓，貼切地呼應張鐵志文章的標題：「我們的民主就是海市蜃樓」^[6]。文化評論者南方朔敏銳地指出台灣政治運作裡的重要潛規則：當權者用人民納稅錢大慷他人之慨，「政商之間親密的如同穿一條褲子，可以透過流標的手段而行綁標圍標之實，甚至商人越俎代庖的幫政府制定工程預算書，這種沆瀣一氣的行為已可謂舉世罕見^[7]」。他認為台灣的不肖政商關係就是台灣的蟑螂，「蚊子館」正是分贓的民主的證物，因此，「必定有蟑螂，而後才有蚊子」。

行動作為公民社會的參與

「蚊子館」是台灣民主進程的惡果。姚瑞中與「失落社會檔案室」共同行動的「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讓惡果顯影；在群蚊飛舞的年代，這部計畫展現了兩個層次的批判意義：第一個層次是對民主制度的批判，直指蚊子館生成的政治經濟土壤；另一個層次則是對準教育體制的僵化，同時也將藝術行動作為民主進程之中對於公民社會參與之培養。

這個行動的開端是一個學期作業。2010年2月底新學期開始，姚瑞中在擔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與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的第一堂課裡，詢問學生對這堂課的期待：是希望按照一般上課方式，由老師講授相關知識，或者是他們願意用這堂課來做「蚊子館」

踏查案？兩所大學美術系五十幾位同學決議以全台蚊子館調查案做為此學期的學期作業。在半年的返鄉調查裡，彙整出一百四十七處「蚊子館」案例，出版第一冊《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勾勒出台灣社會的荒謬現狀。同年，此藝術行動參與2010年台北雙年展的連動計畫，經由媒體大幅報導，引起政府高層的關注，甚至副總統來電關切、以及行政院長召見，會議中指示各單位進行調查，要在一年內活化蚊子館，若不能活化的，考慮拆除。後續時間裡，姚瑞中繼續帶著一批批新加入的學生進行此計畫，在第三冊專書中新增加「已活化或活化中之公共設施」篇章，以附錄方式呈現大量政府會議記錄、公文、方案、閒置建物清冊等。這些陸續出版的專書紛紛寄送到政府各級主管機關，形成一種來自民間的壓力，監督政府決策。

「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產生直接有力擾動政治層面，藝術的力量是其中的關鍵。姚瑞中認為「藝術的重點不是在求取像數學般的解答，不是！它的重點在於這個答案之外，還有什麼？」^[9]此計畫以藝術作為思考的可能性，對於社會議題進行的軟性批判，提供一個公共展示的平台，使更多人得以參與。在此借用德希達與安娜·杜弗勒芒特爾（Anne Dufourmantelle）討論「好客」議題時，杜弗勒芒特爾對於哲學的思考，她說：「對於一個只關注量化利益和效應的社會，最大的威脅就是無用，無目的，絕對的無用，並且拒絕為這種無用、無目的進行辯護……」^[9]，藝術行動的力量即在於此「無用性」，這種無用性成為一種政治姿態，這種姿態象徵性地保護一個空間，本質的東西在這個空間中被說、被突現、被看見。因此，「無用之用」讓不可能的「掀政治的底」之任務達成。

在這個以獨立學習為主的調查案中，雖然學生們的文字、觀點與拍攝的圖象仍顯稚嫩，但從過程來說，學生的共同參與經驗是此行動的價值所在。他們學習的範疇擴大：跨領域視點、田野調查（明查暗訪）、資料收集、發現與指認問題、與陌生人攀談（演技訓練）、翻牆（體力訓練）、追新聞（狗仔隊精神）、攝影外拍、沖片、專題安排、新聞採寫、編輯出版、佈展、與政治人物會面，到接受媒體採訪等。這些涉世未深、還未有深刻社會意識的學生們，在回鄉踏查過程裡漸漸意識到自己所處社會的荒謬與不公不義，由疑惑進而產生社會意識，擴大觀看的視角，肯定小蝦米可以對抗大鯨魚，確切的興起改革的想法，思索行動的可能性。

從一個學期作業為開端，學生們的藝術行動正是公民社會的實際參與，這些行動就像一顆投入池塘的小石子，激起不斷向外延伸的漣漪，擾動了一個表面寧靜的假面社會，讓人不得不直視現實。

台灣民主進程展現在此計畫之中，也出現在不久之前的三一八大太陽花學生運動，在其中看見年輕學子們熱情、認真、理性、堅持守護民主，早已打破以往「草莓族」的狹隘形象，他們既改寫自己的現實，也創造台灣民主歷程新的一頁。

【註】

1. 姚瑞中《台灣廢墟迷走》一書，自序的標題。
2. 張鐵志，〈我們的民主就是海市蜃樓〉，收錄於《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II》，姚瑞中與LSD編，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出版，2011，第18-19頁。
3. 2011年7月11日立報社論以「黑金政治在台灣」為標題，指出兩蔣時代沒有黑金政治，「是不能也，非不為也」。主要幾個原因包含：（1）國民黨在大陸時期貪污橫行，黑金勾結可以用直接手段（今日需透過選舉機制）。（2）黑金政治是大陸時期的國民黨失敗主因，在沒有退路、風雨飄搖的台灣必須收斂。（3）當時驚魂未定的逃亡資本家以及脆弱的本土資本家無力影響台灣政治。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8861> 瀏覽日期 2014.06.23)
4. 黑金政治是指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即「黑道」）或者擁有雄厚實力的財團，通過賄選、非法政治獻金甚至暴力等手段來干預選舉，進而影響整個政治過程。
5. 姚瑞中，〈編者序〉，收錄於《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I》，姚瑞中與LSD編，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出版，2010，第8-9頁。
6. 張鐵志，〈我們的民主就是海市蜃樓〉，收錄於《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II》，姚瑞中與LSD編，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出版，2011，第18-19頁。
7. 南方朔，〈必定有蟑螂，而後才有蚊子〉，收錄於《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II》，姚瑞中與LSD編，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出版，2011，第16-17頁
8. 〈附件六 海市蜃樓計畫：姚瑞中老師訪談〉，收錄於《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III》，姚瑞中與LSD編，台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出版，2010，第617-626頁。
9. 德希達對於「好客」的思考見Jacques Derrida and Anne Dufourmantelle著，賈江鴻譯，《論好客》，桂林：廣西大學出版社，第68頁。